

江西通史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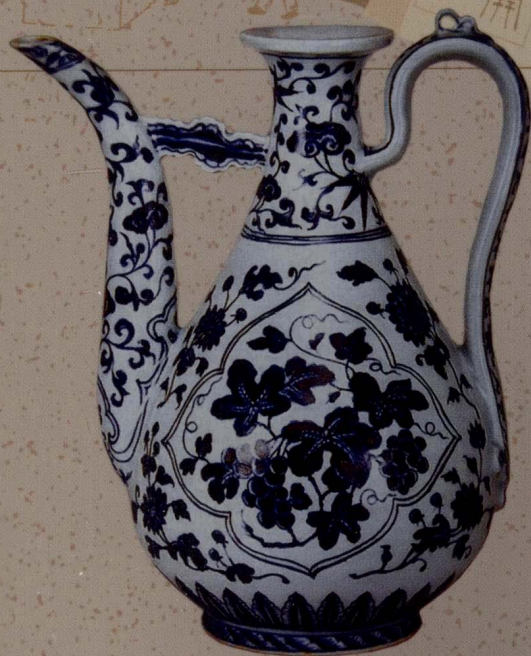
明代卷

钟起煌 主编

方志远

谢宏维◎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主编 钟起煌

顾问 周銮书

副主编 邵 鸿

彭适凡(常务)

方志远

江西通史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通史·明代卷/方志远,谢宏维著. —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2008. 11
(江西通史/钟起煌主编)
ISBN 978 - 7 - 210 - 03977 - 8

I. 江… II. ①方…②谢… III. 江西省—地方史—明代
IV. K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2744 号

江西通史·明代卷

方志远 谢宏维 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34 插页:4
字数:540千 印数:1—3200册
ISBN 978 - 7 - 210 - 03977 - 8 定价:68.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二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钟起煌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机缘而起因执著而成,包括我们这部《江西通史》。

说由机缘而起,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几乎纯属偶然。2002年夏天,我和彭适凡、孙家骅同志谈到江西悠久的历史、谈到江西辉煌的文化,因而产生了组织专家编撰《江西通史》的设想,彭、孙二位当即认为此举当行而且可行。

说因执著而成,是因为一旦有这个想法,而且认为这是一件研究江西历史、弘扬江西文化的重要工程,就决心去做。为此,我征询了周銮书同志的意见,并邀请邵鸿和方志远同志共商此事,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2002年10月18日,在江西省文物局和江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省文博教育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上,我向大会通报了编撰《江西通史》的意见,引起全体代表的热烈反响,大家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挖掘和整理江西传统文化、推进江西经济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有了这个共识,12月13日,准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在我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专家和编辑人员的联席会议,对编撰《江西通史》的指导思想、作者人选、工作日程、成果形式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比较细致的讨论。2003年2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编撰工作会,《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就此正式启动。

虽然说是机缘和偶然,但新的《江西通史》的编撰,实已具备诸多因素和条件。

一、江西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人类的活动至少已有20万年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古代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遂为

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其物产之富、人才之众,举世瞩目;进入20世纪,江西又因为中央苏区的建立而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很难想象,在十分漫长的时段里,没有江西的中国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

二、文献与实物资料丰富。江西既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唐王勃语),又素称“文章节义”之邦(宋司马光语)和“人文之薮”(清乾隆帝语),存世官修私撰文献极为丰富。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既可弥补文字记载之不足,更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证材料和科学依据。

三、前期成果丰硕、学术队伍整齐。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仍然健在,他们不但学术积累深厚,而且对研究江西历史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中青年学者正趋成熟,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思维敏捷,勇于创新。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年来已有大批高质量的有关江西历史的学术成果问世,这些成果涉及江西历史的方方面面,为编撰《江西通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政治环境宽松、经济形势发展。盛世修志是中国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江西经济和全国一样,有较快速度的发展。这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自由的学术气氛和比较充裕的财力保证。近年来,江西的学术事业和出版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连续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给江西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界以振奋,也引起了各兄弟省市的关注。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我们组织大规模著作的编撰工作提供了经验。而周边各省如湖北、湖南、浙江以及其他省市新编通史的纷纷问世,对《江西通史》的编撰是有力的推动,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从我个人来说,当时也恰恰能分出一些精力和时间来抓这件事情。于是尽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作者们、编者排除各种障碍,以保证这项伟大工程的圆满完成。

四年来,《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黄智权、吴新雄省长亲自过问此事并指示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省政协将其作为一件大的文化事业进行推动,省社联将其列为重大科研项目,江西师大、南昌大学、省社科院、省文物局、省博物馆和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也对参与编撰的专家们给予各种便利,出版部门派出了强大的编辑班子并准备了足够的启动和出版资金。特别要指出的是,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能够将《江西通史》的

写作列入重要的工作计划并全身心地投入。我在第一次全体编撰会议上指出,《江西通史》的编撰是一项挖掘和弘扬江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千秋事业,希望作者和编者将其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重大事业。事实证明,作者和编者们后来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正是因为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11卷的《江西通史》才能顺利地完成书稿并得到如期出版。

明代中期,随着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修撰地方志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各省、各府乃至各县的省志、府志、县志大量涌现。此后遂为传统。盛世修志也不仅仅限于修前朝历史,更大量、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乃是修当地地方史。具有全局意义的江西省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自明中期以来,江西整体史著作已编撰过多部,其中著名的有:林庭楫《江西通志》(37卷,明嘉靖四年),王宗沐《江西省大志》(8卷,嘉靖三十五年;万历二十五年陆万垓增修),于成龙、杜果《江西通志》(54卷,清康熙二十二年),白潢、查慎行《西江志》(206卷,康熙五十九年),高其倬、谢旻《江西通志》(163卷,雍正十年),刘坤一、刘绎、赵之谦《江西通志》(180卷,光绪七年),吴宗慈、辛际周、周性初《江西通志稿》(9编,民国三十八年)。20世纪末,又有许怀林的《江西史稿》(1994年,江西高校出版社),陈文华、陈荣华主编的《江西通史》(199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问世。这些著作在保留江西历史遗存、挖掘江西历史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何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对新编《江西通史》的重大考验。

为了使新的《江西通史》更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价值,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对这部著作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一、中国历史是一个整体,我们在研究任何地方历史的时候,都不能脱离这个整体。因此,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江西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必须充分关注江西与中央、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不溢美、不自卑,不关起门来论江西,将《江西通史》写成一部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有着血肉联系的江西历史。

二、《江西通史》是系统记述和研究江西历史的大型学术著作,由众多学者共同参与完成。一方面,各卷是作者的个人成果,是作者最新研究成果的结晶,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所以希望作者精益求精,使其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精品。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又必须是一个整体,是一部“通史”,所以全书11卷必须有统一的体例和统一的要求,在文风上一定要力求简

洁、明快。各卷作者务必服从整体、服从大局,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整个《江西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江西通史》必须是一部真实、动态、有可读性的信史。所谓真实,是指史料翔实、言必有据。此“据”是经过考证后认为合理的,否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语)。这就需要每个作者既尽可能地系统爬梳和挖掘史料,又谨慎辨析和使用史料。所谓动态,是指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将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又特别关注它的演进过程,因为即使是同一件事物,其状态和作用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需要每个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阐释历史、去探讨历史演进的规律。所谓有可读性,是指应该用流畅的文字、叙述的方法写作,展示的是作者的观点和结论,而不是考辨的过程,它的体例是史书而不是论文。无图不成书。图文并茂是中国出版物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特点,《江西通史》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收集能够说明江西历史各阶段各方面状况的历史图片,以加强其历史感和可信度,同时也使其更具有可读性。

四、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基层社会为本。所谓以人为本,指的是要写成人的历史,以人的活动为描述对象,即使是制度、习俗,也应尽可能地有人的活动。所谓以民为本,指的是尽可能地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来叙述历史、看待历史,更多地叙述大众的活动。所谓以基层为本,是因为地方史本身就是基层乃至底层的历史,要尽可能地揭示基层组织和底层社会的活动状况。在此基础上,充分重视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对社会的主导作用,重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特别是包括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政治制度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对个人、对大众、对底层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写成一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动、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互动、社会精英与人民大众互动的历史。

11卷本《江西通史》即将付梓,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够成为江西历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能够成为江西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当然,能否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由读者和历史来检验。

引言

—

人们总是喜欢将“明清”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而说到明清,总免不了要说两件事情,一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二是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这两件事情其实也是前辈学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研究明清史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倾注了许多学者的毕生精力和心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当站在更为客观的立场上重新考察明清历史时,上述结论的某些片面性也就凸现出来。暂且不说如果不是鸦片战争、如果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猛烈撞击、如果不是中国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之中,明清时期能不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我们通常所说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等现象能不能视为引导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即便是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也未必就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冰冷灰暗。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矛盾是绝对的,统一则是相对的。同样,专制、集权是相对的,自由、开放却是绝对的。所以,尽管明清政府在大多数时间实施海禁,但私人海上贸易却从未间断;尽管明清政府实施食盐管制,但私盐也从未真正得到有效禁止。同样,尽管明清政府(其实不仅仅是明清政府)总是企图将社会纳入统治者规划好的蓝图,但社会的发展却极少按照统治者安排好的轨道行进;尽管明太祖和清世宗都想建立起按个人意志办事的国家体

制,但他们的个人意志最终仍得适应变化万千的社会生活。

近年来,明清史特别是清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充斥屏幕的清宫戏(近期明宫戏也有方兴未艾之势),更将大众的视野拖入历史。如何认识明朝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每个明史研究工作者和清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根据我的理解,明代、清代其实和汉代、唐代和宋元乃至南北朝时期、宋辽金时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明史研究者,我从来不认为明代比清代或汉、唐、宋、元更为重要,也对一些断代史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无限拔高觉得“甚无谓也”。中国历史发展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朝代又都有自身的特点和个性,这才是历史研究者所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对于明代和清代的历史个性和相互关系,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就政治态势而言,清朝通过对周边用兵并辅之以宗教和民族政策,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有国外学者将清朝的疆域说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东北至库页岛东北角,西北至巴尔喀什湖西北角,南到马来半岛的南端,总面积近2000万平方千米,比明朝要风光得多。而康雍乾持续一个半世纪的“盛世”,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对此进行研究和宣传,无疑可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何况清朝还有一批勤政的皇帝。反观明朝,虽然太祖、太宗(成祖)有不少善绩可陈,但洪武、永乐间的严刑峻法、草菅人命却令史臣在进行掩饰时左右为难。其后继者,或者善于作秀而并无多少雄才大略(如宣宗),或者视皇位为儿戏故从不干正经事(如武宗、熹宗),或者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而梦想做“英主”(如英宗、思宗),或者上朝听政如木偶而于国家大事一窍不通(如宪宗、穆宗),或者干脆不视朝不见大臣却自以为“乾纲独揽”(如世宗、神宗)。侍候这样的皇帝,明朝的大臣们只得在无奈之中津津乐道于“垂拱而治”。宦官参政专权,虽然不像唐朝那样可以废立皇帝,但至少可以进退大臣。大学士和言官们的大量时间及精力耗在了劝导和阻止皇帝及宦官们对国家事务的“破坏”,但皇帝和宦官却认为干坏事的不仅仅是他们。被认为糊涂透顶的武宗却说出了十分清醒的话:文官中好人仅有三四,坏人却占了六七。

二、就经济社会而言,明朝由于土地兼并和前期政策的僵化产生大量的流民,这些流民或者进入山区,为开发山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时时和土著及官府发生矛盾,并酿成多起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或者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他们又是城市中的“无根之徒”、动乱之源。徽商、晋

商、江右商、闽粤商、两湖商，苏州、扬州、杭州、松江、临清，毋须历史学家的叙述，即从《三言》《二拍》中也可以体会到明代城市生活的富丽多彩。且不说苏杭嘉湖地区星罗棋布的繁荣市镇，即使是江西的景德镇、樟树镇，湖广的湘潭，广西的梧州，也是商贾成云、货积成山。但就传统眼光看，这种活跃和繁荣却不得不受到指责，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清朝矫枉过正地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小农社会，人口流动多往边境，既开发了边疆，又至少在乾隆退位之前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社会稳定，社会财富自然积累，北京、苏州、汉口、佛山成了天下货物的“四大聚”。

三、就思想文化而言，尽管明太祖“以重典治天下”、明成祖以“瓜蔓抄”诛杀方孝孺十族，还有王振、魏忠贤当道时的恐怖，但明朝在总体上却是自由奔放的；尽管清康熙帝号称开明、乾隆帝堪称风流，也有于成龙等人的铮铮铁骨，但清朝总体上是严峻冷酷的。明代中期以后，是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引导社会思潮，是商人的消费方式影响价值观念。阳明学派、泰州学派，前后七子、江南四子，台阁派、公安派、竟陵派，传奉官、马尾裙，民歌、时调、小唱，形形色色的思想家、文化人，富商、巧匠、名妓，名儒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异端王艮、颜钧、何心隐，山人徐渭、陈继儒、乐新炉，“洋僧”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基督教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洋人的书、洋人的炮、洋人教师，光怪陆离，目不暇接。自由之风、西方之学，犹如润物之和风细雨，细致入微。清代则是统治者的思想领导社会潮流，直至晚清，肃杀之气尚存，致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粱谋”之叹。即以文字狱论，明朝的文字狱大多为胡乱杀人，清朝的文字狱则为蓄意杀人，其后果遂全然两样。明朝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清朝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惩罚，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其实是在清朝被折断的。在洋务运动发生之前，他们的聪明才智皆用于“朴学”即考据之学，虽然远离了社会远离了民众，听不到他们关注社会关注民众的呼声，但对于整理中国古籍，却多有贡献。至于洋人，倒是在康熙时做了一阵子花瓶，而雍正帝则将他们统统赶到澳门，省去许多麻烦。但当洋人携带着坚船利炮卷土重来之时，却瞠目不知所措。

这其实又是明代和清代社会的三大差异或者说各自的三大特点，至少是本书作者对明清两代时代精神和人文面貌的认识。但心态的矛盾也因此而生，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清代有借鉴意义；但从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来说，

似乎明代更具有胸襟气度。

二

江西人应该对王勃有感恩之情。尽管王勃在初唐时说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外地人对好客主人的客套,却成了江西在唐末五代以后经济文化发展繁荣的预言。而这一预言之变为现实,则是与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同步的。它既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结果,又是其重要内容。其间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中心的东移和运河的开通,使鄱阳湖及赣江成为南北物质交流的重要通道。

大运河开凿之前,中国南北水路交通的最长航道为汉水—长江—湘江、沅江,汉水—长江—赣江。灵渠的开凿以及秦岭和大庾岭山路的开通,使这两条航道在陆路的连接下向北延伸到了黄河水系的渭水和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并进而沟通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自秦汉到隋唐,由于政治中心一直在关中,所以从西北政治区到东南经济区的水路沟通主要是由汉水和长江完成的;而与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的内河交通,则是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

两汉时期,关中地区的财力已表现出难以支持全国政治中心的无奈。从隋文帝带领政府官员和关中百姓“就食”洛阳,到隋炀帝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实质上反映了西部政治中心从被动到主动向东部经济重心靠拢的趋势。从五代到北宋,完成了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过程;元、明、清的定都北京,更巩固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的格局。虽然比起开封,北京距离东南经济发达区更为遥远,但运河的全线开通,却将这一空间距离大大缩短。政治中心东移及大运河开通之后,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这一南北交通要道失去了往昔的地位;而运河—长江—赣江—北江—珠江则成为国内最为重要的南北通道。这条通道全长2000多千米,贯穿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八省市,在江西境内几占1/3。

二是中原地区的战乱导致大量北方人口的南移,江西则因远离战乱又相对靠近政治中心而成为北方人口的避难所。

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中原地区发生的三次大的长时期战乱关系密切。

第一次是两晋之际“永嘉之变”后发生的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五胡乱华”的事件,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北方的长期战乱和中国境内南北政权的对峙;第二次是唐天宝年间开始发生的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北方陷入长时间的动荡和藩镇割据、五代凌替;第三次是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宋室的南渡和宋金之间的持续战争及对峙。三次战乱都导致了北方居民的大规模举族南迁。北方居民迁徙的落脚点,总是在那些既远离战场又便于返回中原的地区。于是,当战乱发生在黄河流域时,移民便主要迁移至江淮之间,九江及赣北地区开始接纳移民;当战乱延伸到淮河一线,移民便迁移至长江以南,南昌、鄱阳、宜春及赣中也有了大量的移民;当战乱蔓延到长江两岸,移民便被迫继续南移,吉安、抚州乃至赣州也就有大批移民迁入。

北方移民洪水般的涌入,既为江西的开发带来了大批劳动人手,更将相对发达的中原文化及宗族制度带到了江西,并促成了中古以来江西家族的发达和“耕读治家”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与江西的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使得江西人进可入仕取得功名、退可家居温饱无忧。孟子所说的“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江西人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宋元明时期江西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明代江西的发展,既是宋元时期江西发展的继续,也是因为这时出现了有利于江西经济文化发展的形势或机遇。而这种形势或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一是元末战乱与明朝的统一,其二是明政府推行的禁海政策。

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起义开始,中原及其边缘地区即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陕西及江苏北部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的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相比之下,东南地区的战事则较为缓和。明太祖以南京为基地,经营江南,江西是第一个设立行省的地区。虽然也经过鄱阳湖大战,但为时甚短,且是一战而定,全省几乎传檄而下,没有发生反复的大规模拉锯战,故此战祸较少。此后明军进兵湖广、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北伐中原的主力虽从南京出发,军需给养却有相当多依赖于江西。而且,北伐偏师也是从江西、湖广进军河南、陕西、四川的。于是奇迹出现了:随着明军的推进,开始了江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向外移民运动。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大潮也在这个时期形成并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而江西商人经营的商品,又多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粮食、布匹、木材、纸张、瓷器等,适合经受战争劫难地区的需要。这一情况的发生,既使江西

的经济文化影响扩散于全国各地，而对于江西境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倭寇的骚扰、葡萄牙等西方国家商人的东来，以及统治者希望建立一个稳固不变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因而明政府实行了长期的海禁。接待外国使者及管理朝贡贸易的市舶司也由元朝的七个减为宁波、泉州、广州三个。而且规定，宁波市舶司只许接待日本使者，泉州市舶司只能接待琉球（今日本冲绳）使者，同时限定了进贡的周期和贡船、贡使及随行人员的数量。只有广州市舶司被允许接待东南亚及印度洋（以及此后的欧洲）地区的贡使和商人。从官方贸易而言，实际上是广州一口通商。这一政策后来为清朝统治者所继承。这样一来，不仅南北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主要依靠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水上通道。虽然海上的走私活动从来没有真正被禁绝，但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官方的一口通商格局并无大的变化。这使得江西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三

江西人无疑在明代历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致使明朝的所有故事，无论是风光的故事还是尴尬的故事，都少不了江西人的表演。无法想象，没有江西人的明代会是什么样子。

说到明代的江西，江西的文化人往往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遍及中国中南及西南地区的江西移民，起步甚至比徽商晋商更早而且无所不在的江右商人，从明初直至嘉靖时期独占鳌头的科举考试，从解缙、胡广、杨士奇到费宏、夏言、严嵩的长期主持内阁，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为数众多的江右王门学者，“赤手搏龙蛇”的异端思想家，橹声不绝的赣江、信江、修水、抚河、袁河，敢于在戏曲之乡绍兴、海盐叫板的弋阳腔，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希望在《江西通史·明代卷》中所表现的。

但是，虽然我们常说不能分割历史，虽然我们也很想描述一个完整的明代社会、描述一个完整的明代江西，但限于篇幅和学识，只能是在尽可能地关注整体明代江西的基础上，对一些自己长期关注并有一定研究基础的断面进行讨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江西通史·明代卷》即是如此。

在这部著作中，我们比较详尽地讨论了我们认为明代江西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元末明初开始的江西人口向湖广、向西南地区的流动问题。先是自发的人口流动，继而是政府的大规模强制移民，接着又是持续性自发移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贯穿着整个明清时期，成为持续影响当时中国整体经济社会的重大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数百上千万江西人口拥向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在一段时间也涌向河南），他们在那里开垦荒地、发掘矿产、交流物质、传播文化，不仅成就了一个通过地缘、血缘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湘鄂赣经济区，而且与广东、福建、湖广等地移民和土著居民一道，造就了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对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据明清两代《实录》记载，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及缅甸、越南的许多村寨，其首领也多有江西移民；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常将土司酋长移居江西，原因是他们的祖籍就在江西。而近年发现的家谱等资料显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等，其祖先均在明代由江西迁往云南、四川、湖南等地。1934—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一、二方面军在云南威远扎西镇会师，一方面军总部驻地为江西会馆，二方面军总部驻地为湖广会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中央红军从赣南开始的长征，其行军路线或许也受到明清时期江西移民路线的启发。

在本书中，我们也比较详尽地讨论了由于明代江西人口流动和农业、手工业商品化而导致的令人瞩目的明清江右商现象。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张瀚《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明成化间吉安彭华说：“（吾乡）商贾负贩遍天下。”明末抚州艾南英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说：“无江西人不成市场。”清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1881—1890年）说，云南蒙自有七个矿业会馆，其中四处为江西人所建。近人丁文江院士在《天工开物》重印时为宋应星作传称：宋应星所以能作《天工开物》，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矿业“皆操于先生乡人（按：即江西人）之手”。江西商人以其众多的人口、广泛的行业、极强的渗透力，对明清经济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明清江右商是一持续现象，所以经与《清代卷》的作者商议，本卷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不仅仅限于明代，也延续到清代。

江西经济（这里主要指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唐末五代以来中国经济重心

南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其原因和结果。湘鄂赣地区粮食生产基地的形成,对于先后位于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的中国政治中心的稳定,对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玉米、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的种植,茶、麻、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江河湖泊的水产资源和丘陵山区的木材资源,景德镇的瓷、樟树镇的药、铅山的纸、金溪的书,不仅养育了数以千万计的江西人口,也为数以百万计的江西商人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不仅从各方面加强了江西的经济地位,也为政府提供了更多的税收。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也力图对这一现象予以描述。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了一则与友人听口技的故事:

一日,同社馆东郊外韦公庄者,邀往宴集,诧谓余:有神技可阅。既酒阑出之,亦一瞽者,以小屏围于座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贩姜邸中,为邸主京师人所赚,因相殴投铺。铺中徒隶与索钱,邸主妇私与徒隶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妇,其声嘈杂,而井井不乱,心已大异之。忽呈解兵马,兵马又转解巡城御史鞠问。兵马为闽人,御史为江右人,掌案书办为浙江人,反复诘辩,种种曲肖。廷下喧哄如市,诟詈百出。忽究出铺中奸情,遂施夹拶诸刑,纷纭争辩,各操其乡音。^①

这段口技的精彩,不仅仅在于表演者以一人之力,模仿出“或南或北或男或妇,其声嘈杂,而井井不乱”,也不仅仅在于表演者能使所模仿的人物“纷纭争辩,各操其乡音”,还在于表演者将各地的职业特征也充分表现出来:贩姜的商人为徽州人即徽商,坐铺的邸主为京师人即当地人,兵马司官员为福建人,御史为江西人,书办则是浙江人。而这种职业的地域特征,恰恰与现实相吻合:在当时的地域性商人中,以徽商影响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乡音最为合适;江、浙、闽为科举大省,尤以江西为甚,而科道官须进士出身,故御史用江西乡音,兵马司则用福建乡音;绍兴师爷的前身——浙江书办当时已是一大社会现象^②,故书办用了浙江乡音。虽然万历时期两浙的科举势头已经超过江西,但作为京师艺人的“瞽者”和浙江士人沈德符,仍然感受到江西人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技艺·李近楼琵琶》。

② 参见方志远《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地位。本书自然要对这一状况作恰当的表述。

江西至少存在着三组对应的文化现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附庸文化与异端文化、摇篮文化与主流文化，而这三种文化又在不断地转化之中。本书也试图对明代江西的这一现象进行讨论。以今天的眼光看，尽管地位有高低、境遇有穷达，朱权、解缙、杨士奇、汤显祖、宋应星、艾南英等人所代表的，自然属于精英文化；而大量“无名氏”农民、工匠、商人、术士、儒士在生产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则应该属大众文化。三千名进士、数量居全国首位的举人，以及无数修习“举业”的士人、无数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仕途的各色人等，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主要是附庸文化；而朱季友、李孜省、颜钧、何心隐以及尚未被主流思潮接受时的崇仁学派及王门诸弟子、被正统儒学视为邪术但又在江西乃至全国广泛流行的种种思潮及法术，自然属于异端文化。由于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性的政治中心，甚至也很少成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所以江西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摇篮文化的特征。从这里可以走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也可以走出未来的富商巨贾，但在本地却很难产生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更难以产生富商巨贾。但在明代，这里恰恰一度成为政治中心、学术中心、经济中心，所以恰恰又产生了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江西文化也一度由摇篮文化演变为主流文化。王阳明的心学在这里由异端变为主流，汤显祖、宋应星、艾南英也在这里完成了由大众文化向精英文化、由摇篮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变。在江西发生的这些现象，在全国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无论是精英文化、摇篮文化、附庸文化，抑或是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异端文化，以及有名无名的代表人物，均在明代社会历史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都是中国明代历史的创造者。本书理所当然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叙述。

至于明朝在江西统治的建立及维系，明朝政府在江西的各级管理机关及其在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代地方史书所不能忽略的，本书在这方面也作了一定的叙述和讨论。

四

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

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

有司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①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说：

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鹤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潘榕皋（弈隼）农部《游虎丘冶坊浜诗》云：“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真仁者之言也。^②

苏、杭号为“人间天堂”，岂止是富人的天堂，也为穷人准备了无数的就业岗位和致富机遇。富人的财富固然是由穷人创造，但没有富人的消费，便没有穷人的生计。而富人的消费，自然应该包括文学、艺术、娱乐等在内的精神消费。否则，饭馆只是填充肚子的所在，妓院只是发泄性欲的场所，消费也就必然是浅层次和低价位的消费。从一定意义来说，它决定着城市的繁荣程度与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是一个地区商品经济能否得到发展的重要因素。越是大的消费中心，越是有高消费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城市也就越繁荣，对周边地区商品生产的刺激也越大。

王士性《广志绎》同时记载了明代大多数江西人的生活习性：

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粟几多，解囊中装余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困廩，则床头瓶罍无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即囊无资斧者，且暂遣亲邻，计足糊家人口，则十余日而男子又告行矣。以故大荒无饥民、游子无内顾。盖忧生务本，俗之至美。^③

虽说是“至美”之俗，却脱不了“愁苦”之状。尽管初唐时期王勃就为江西人

①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浙江》。

②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安顿穷人》。

③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